普陀山外文石刻背后的百年跨国缘

□记者 何菁

海浪经年不息地拍打着百步沙的礁石，在普陀山这片浸润着禅意的山海之间，一块临海矗立的巨石已沉默百年。

石面上，篆书“师石”二字刚劲端庄，楷体题偈“耐风雨，质坚洁”诉说着君子风骨，北侧“回头是岸”的题刻暗含禅机。这些跨越百年的汉字题刻，早已融入普陀山现存150余款摩崖石刻的文化长卷，成为普陀山厚重的历史注脚。

在石下，还有一行浅浅的英文字母，揭开了一段被遗忘的跨国交流往事，也让一位宁波老外滩外籍建设者与普陀山的不解之缘浮出水面。

普陀山的外文石刻源自何人

普陀山的摩崖石刻，可以说，就是一部镌刻在山石上的立体史书。自元代起，文人墨客、高僧大德便在此留下题刻，明清时期达到鼎盛，现存150余方。这些石刻或藏于崖壁，或立于沙滩，题材涵盖佛教箴言、文人题咏、记事丰碑等。

比如，短姑道头的“佛放光明”题刻，传为明代高僧憨山德清所书，笔力遒劲，是佛教文化在普陀山扎根的重要见证；梵音洞的多民族文字咒语铭刻，融合了汉、藏、蒙等文字，印证了古代多民族文化在此交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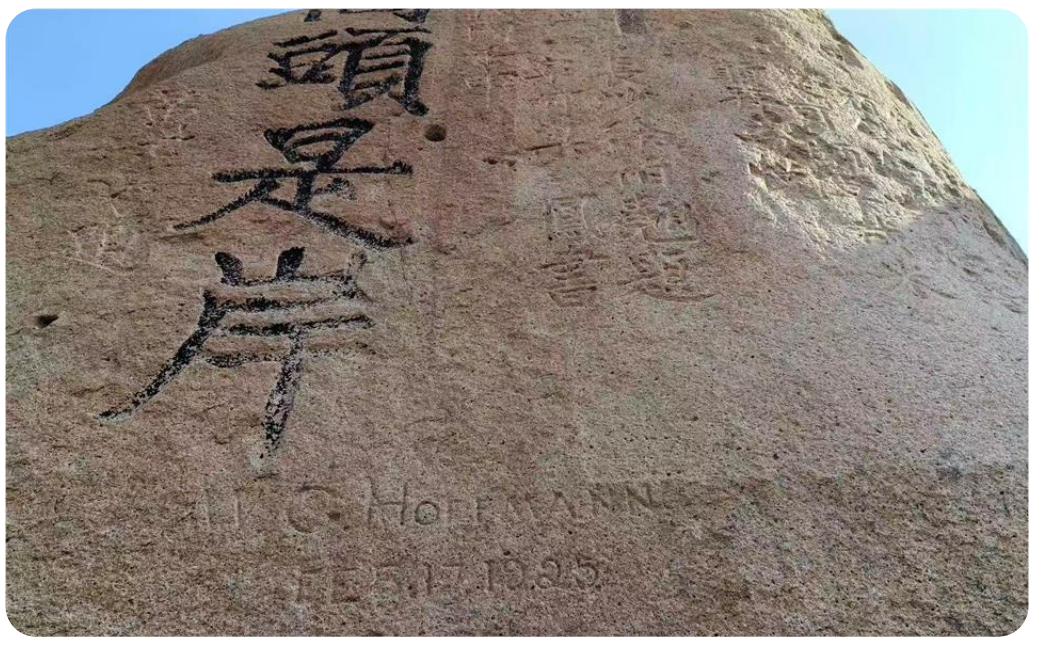
冬日的普陀山，有着别样的清寂之美。在百步沙滩中段的一块巨崖，镌面朝西，背对大海，留存着两款珍贵的石刻。

第一款为“师石”，篆书直书单行，字径0.8米，字迹刚劲中透着秀丽。其下方的楷体题偈“形奇怪，俗气绝。耐风雨，质坚洁。能当怒涛，能磨顽铁。如斯如斯足可师，卓哉米颠拜而悦”，直书六行，字径0.15米，既描绘了巨石的形态特质，又点明了“以石为师”的深意。东侧落款“民国廿六年元旦长沙徐伯翘题，宁乡梁风书”。徐伯翘为民国时期湖南名士，梁风则是当时著名的书法家，其楷书以端庄规整著称，二人合作的这款题刻，堪称民国石刻中的精品。

第二款“回头是岸”题刻，楷体直书单行，字径约0.46米，镌于“师石”北侧。南侧题“民国壬申”（即1932年），北侧款“黄元秀题”。黄元秀为近代著名武术家、佛学家，曾任浙江国术馆副馆长，他一生潜心佛法，多次游历普陀山，这款题刻既契合了普陀山的禅意氛围，也寄托了其劝人向善的人生理念。

若走近这块巨石仔细端详，便会在右下方发现两行浅浅的英文字母，内容为英文，开头字母高10厘米，后续字母高7厘米，分两行书写。上行“W. G. Hoffmann”（W. G. 霍夫曼），下行“FEB. 17.1925.”（1925年2月17日），均以大写字母书写。

这行外文题刻的出现，让研究者们陷入了困惑：为何在这座佛国名山的传统石刻旁，会出现英文题刻？题刻者究竟是谁？



普陀山外文石刻

一段跨国因缘的百年回响

事实上，这行英文题刻很早前便进入了研究者的视野。普陀山文化研究者洪波雷回忆，多年来，他查阅了大量民国时期的普陀山游记、地方志及外籍人士往来档案，却始终未能找到关于题刻者“W.G.Hoffmann”的蛛丝马迹。直到近日，在柏林自由大学博士生Wes的协助下，一份保存于德国国家档案馆的“1923年江北岸工程局委员会名单”被洪波雷发现，名单中“William George Hoffmann”的名字简写后与石刻上的“W.G.Hoffmann”完全吻合。

循着这一线索，洪波雷比对了宁波江北老外滩的建设档案、海关贸易名录等。查明霍夫曼为英国人，1921年受委派，前往宁波参与老外滩的建设。宁波老外滩的初步建设是在19世纪中叶，当时英、法等国的商人和领事馆开始在宁波江北岸建立据点。这些外国势力在宁波建立了领事馆、银行、轮船码头等建筑，形成了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宁波老外滩的基本格局。

那么，这位外籍工程师为何会远赴普陀山，并在“师石”上留下题刻？洪波雷结合历史背景推测，民国时期的普陀山已成为国内外知名的旅游胜地与佛教圣地，其中不乏外籍商人、工程师、传教士等。而百步沙浴场作为当时普陀山最负盛名的景点之一，因沙质细腻、海水清澈，深受外籍人士喜爱，不少外国人会在周末或节假日从宁波乘船前往，享受海滨风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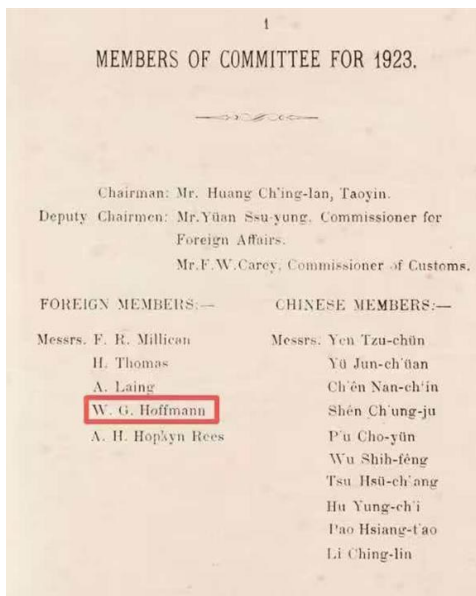
洪波雷推测，1925年2月17日，霍夫曼或许是在工程间隙，与友人一同游历普陀山，被普陀山的山海风光所沉醉，于是刻下了这两行石刻。后来，这方岩石上又有了“师石”题刻等两处中文题刻。可以说，无形之中这一行为，既是西方文化中“石刻留名”传统的体现，也暗含了对东方君子风骨的认同，成为中西文化碰撞的即兴之作。

这段题刻的发现，并非孤例，而是民国时期普陀山跨国文化交流的生动缩影。民国初年，随着海上交通的便捷，日本、泰国、锡兰（今斯里兰卡）等国的佛教信徒频繁往来普陀山。同时，西方学者也纷纷前来考察，德国汉学家恩斯特·柏石曼游曾在游历普陀山时，拍摄了大量摩崖石刻照片，收录于其著作《中国的佛教石窟》；日本高僧常盘大定则盛赞普陀山为“东方佛教文化的瑰宝”。霍夫曼的题刻，正是这股跨国交流浪潮中的一个鲜活注脚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在“师石”石刻不远处，矗立着一块特殊的石碑。这是1985年8月普陀山管理局立于百步沙的中英双语碑，也是普陀山最早的双语碑。碑文左侧为中文“百步沙”，右侧为英文“Baibu Beach”，下方附有简短的景点介绍。这块石碑的设立，既是对普陀山对外开放的纪念，也与近百年前霍夫曼的英文题刻形成了奇妙的呼应，见证了普陀山从民国时期到当代的跨文化交流传承。

如今，当游客驻足“师石”前，触摸着历经风雨的石痕，既能读懂“如斯如斯足可师”的东方智慧，感受“耐风雨，质坚洁”的君子风骨，也能透过那行浅浅的英文字母，想象百年前霍夫曼游历此处时的心境。普陀山的摩崖石刻，早已超越了宗教与地域的界限，成为多元文化交融的见证。

图片由洪波雷提供


1

MEMBERS OF COMMITTEE FOR 1923.

Chairman: Mr. Huang Ch'ing-lan, Taoyin.
Deputy Chairmen: Mr. Yüan Ssu-yung, Commissioner for Foreign Affairs.
Mr. F. W. Carey, Commissioner of Customs.

FOREIGN MEMBERS:—
Messrs. F. R. Millican
H. Thomas
A. Laing
W. G. Hoffmann
A. H. Hopkyn Rees

CHINESE MEMBERS:—
Messrs. Yen Tzu-chün
Yü Jun-ch'üan
Ch'en Nan-ch'in
Shen Ch'ung-ju
P'u Cho-yün
Wu Shih-fêng
Tsu Hsü-ch'ang
Hu Yung-ch'i
Pao Hsiang-t'ao
Li Ching-lin

1923年江北岸工程局委员会名单

再探南宋枢密左丞郎惠墓之谜

□武锋 卢莹 文/摄

定海区东海云廊擂鼓山段“怀古园”的几件石人、石虎，是古人墓道前的石像生，其规格等级非同一般。它们原为浙江海洋大学所藏，出土于定海擂鼓山下，后随浙海大搬迁至长峙校区，如今回归原址，也算物尽其用。这些石像生文物价值极高，在舟山地区颇为罕见，笔者建议相关部门组织力量对其展开专项研究与保护。

至于这批石像生所属的墓主究竟是谁，舟山文史学界历来多有探讨，众说纷纭，至今仍无定论。《舟山日报》2016年5月22日曾刊发《揭开南宋枢密左丞郎惠墓迷雾》一文（以下简称“《揭》文”），认为墓主就是舟山古代地方志中记载的郎惠，并援引《后郎郎氏宗谱》（以下简称“《宗谱》”）中郎惠的相关资料作为佐证。《揭》文以《宗谱》为切入点考证墓主身份，确实别出心裁，不失为一种研究历史的新思路，颇具启发意义。但《揭》文依据《宗谱》得出的部分推论，尚有可商榷之处。笔者就此谈谈自己的认识，并对墓主身份提出一些看法。

“怀古园”内石人、石虎

《后郎郎氏宗谱》郎惠资料辨正

《揭》文所依据的《宗谱》，现藏于美国犹他州家谱中心。谱中确实记载有一位南宋人名叫郎惠，称其“由太学举进士，官枢密、左丞”。这一记载，与舟山古代地方志所载“郎枢密墓”“丞相郎惠墓”的信息似乎高度吻合。那么，二者是否为同一人？

笔者查阅了这部《宗谱》，发现每页页边均标注“丁巳年重修”字样。检索美国犹他州家谱中心网站可知，该谱重修于1917年，而1917年恰为丁巳年，与谱中信息一致。也就是说，这部《宗谱》的重修时间距南宋已七百余年。以百年前重修的宗谱佐证近千年前的历史人物，其史料效力需要审慎考量。《宗谱》卷首虽录有南宋马廷鸾所作序言，但这并不能证明郎惠的相关记载源自宋代。后世重修家谱时，抄录前谱内容的情况十分普遍，而屡次重修的过程中，后人极有可能对早期史料进行了增补与加工。

《揭》文据《宗谱》推论：“郎惠应是1200年后出生、1229年间登进士，也就是在宋宁宗期间度过青少年，宋理宗时进入仕途，担任南宋末年的枢密、左丞，死于南宋灭亡之前。”结合《宗谱》原文来看，这一推论与谱载信息存在出入。根据《宗谱》卷三《行传》记载，郎惠“字时恩，由太学登进士，官拜枢密、左丞，夫人宋氏，生子一，槊。公生于绍兴戊寅年十月□日”。绍兴戊寅年即南宋绍兴二十八年，公元1158年。《揭》文推定的出生年份与谱载年份相差近42年，由此推导的郎惠生平序列，自然需要重新梳理。

《揭》文称：“郎惠家族因余天锡等人的介绍而避乱到舟山。”据史料记载，余天锡生于1180年，郎惠若生于1158年，年长余天锡22岁。倘若郎惠确有其人，那么在他避乱舟山之时，余天锡很可能尚未出生，相关说法的时间线便难以对应。

《宗谱》关于郎惠的记载，细节有些缺乏。笔者认为，一位曾官至枢密、左丞的朝廷大员，相关记载却如此简略，这一情况值得留意。

笔者翻查资料未发现郎惠的踪迹。检索《二十五史补编》宋代部分，亦无相关记载。清代万斯同所撰《宋大臣年表》，详细罗列了两宋历任枢密使、丞相、参知政事等高官的任职信息，却未收录这位“枢密左丞郎惠”。笔者认为，历史上的官员即便经历浮沉，其基本履历也会被史书记载，而郎惠身为高官却在现存史料中难觅踪迹，这一现象有待进一步探究。

由此，笔者对《宗谱》所载郎惠的官职信息，以及此人是否为舟山地方志中记载的郎惠，均持审慎探讨的态度。笔者认为一个比较合理的解释是：1917年重修《后郎郎氏宗谱》时，编纂者见地方志中有郎惠的记载，便将其纳入宗谱。编修家谱时，往往会收录地方史志中的相关人物，而地方志称郎惠官至枢密左丞，身份颇为尊贵，恰好与宗谱中的郎惠重名，故而被收录其中。

不过，笔者认同《揭》文的另一观点：这批石像生为南宋遗物，且规格极高，墓主应是三品以上的官员。墓前能设置如此高规格的石像生，墓主显然不可能是获罪之臣——若真获罪，后人既不敢也不可能为其树立石像，朝廷也绝不会准许。

一个新的推测

其实，要确定这批石像生的墓主身份，可以从一个基本前提入手：墓主为南宋人，且曾任三品以上高官。而符合这一前提的舟山籍名人，仅有两位，即余天锡与应繇。二人的传记分别载于《宋史》卷四百一十九与卷四百二十。据《宋史》本传记载，余天锡曾任吏部侍郎、户部侍郎、参知政事、同知枢密院事等职，死后追封奉化郡公，赠少师，后加赠太师，谥号“忠惠”；应繇曾任礼部侍郎、参知政事、同知枢密院事等职，封临海郡侯。

据舟山多位文史学者考证，应繇墓于20世纪50年代在定海城西盐仓浦东被发现，墓前文物仅存一只石羊，现藏于舟山博物馆。这一发现，与明天启《舟山志》所载应繇墓“在城西四十里”的方位大体吻合；即便与康熙《定海县志》记载的“城西二十五里”存在距离差异，基本方位也相去不远。而浙江海洋大学所藏的这批石像生，出土于定海擂鼓山下（此地旧属浙江海洋大学文化路校区），由此可推断，墓主绝非应繇。那么，这批石像生的墓主，最大的可能就是余天锡。

明天启《舟山志》与康熙《定海县志》均记载有“郎枢密墓”，后者还补充道“讳惠，字无考”；及至光绪《定海厅志》，则直接称之为“丞相郎惠墓”。如此一来，一位官至丞相的“郎惠”相关记载便逐步丰富起来。既然浙海大所藏石像生的墓主并非郎惠，为何舟山部分古代地方志中会出现相关记载？笔者认为，这一谜团可从余天锡的任官经历与谥号中找到答案。

前文提及，余天锡曾任参知政事、同知枢密院事等职，谥号“忠惠”。据此推测，余天锡的墓碑上，或许刻有“宋参知政事同知枢密院事吏部侍郎忠惠余公之墓”一类的铭文。民间百姓提及此墓时，不会复述这一长串繁琐的官衔，为便于记忆，便将其简称为“丞相枢密墓”“丞相侍郎墓”“侍郎忠惠墓”等。久而久之，口耳相传中便讹变为“郎枢密墓”“丞相郎惠墓”。此外，若年代久远，墓碑经风化侵蚀，铭文漫漶不清，仅残存“□郎□惠□□之墓”等字样，也极易被误传为“郎惠之墓”。

因此，笔者倾向于认为，浙江海洋大学所藏的这批石像生，其墓主并非郎惠，而是南宋名臣余天锡。

不过，这一推测仍存一处疑点。关于余天锡墓的位置，明天启《舟山志》最早明确记载其“在城东七十里小展岙之南”，康熙《定海县志》亦载“在城东北小展岙南”。如今，舟山余氏后人主要聚居在黄杨尖小展岙一带，当地不仅有余氏祠堂，还建有余天锡墓（笔者曾实地踏勘）。

若定海擂鼓山下的石像生确属余天锡墓，便与地方志记载的墓址位于小展岙的说法相矛盾。对此，笔者提出两种推测：其一，地方志的记载或许存在谬误。明代舟山历经明初海禁、迁民以及倭寇之乱，史料多有散佚，历史传承的连续性被打破，后世修志者追溯前代史事时，难免出现记载偏差。其二，余天锡墓或许原本就在小展岙，墓前石像生后来被迁移至定海，挪作他用。

至于真相究竟如何，尚有待进一步考证。

作者单位：浙江海洋大学